



Lizenz Zum Töten

109

新知
文库

非外借

杀人执照

情报机构的暗杀行动

[德] 埃格蒙特·R. 科赫 著

张芸 孔令逊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人执照：情报机构的暗杀行动 / (德) 埃格蒙特·科赫著；张芸，孔令逊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2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6692-3

I. ①杀… II. ①埃… ②张… ③孔… III. ①信息工作—研究 IV. ① G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1879 号

责任编辑 曹明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康 健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9-437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5.25

字 数 305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5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109

新知
文库

XINZHI

Lizenz Zum Töten:
Die Mordkommandos
der Geheimdienste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受命于国家犯下罪行，这种特殊情况绝不能令行动参与者免除刑事责任。每一个政府组织都可以而且必须要求，任何人都要无条件远离犯罪，即使有人滥用国家权力要求他这样做。否则任何制度都会瓦解，都会给政治犯罪敞开大门。

——德国联邦法院针对克格勃杀手
伯格丹·施塔辛斯基 (Bogdan Staschinski)
谋杀案的判决书，1962 年 10 月 19 日

目 录

1 前 言

9 第1章 无法官判决：情报部门的谋杀行动

美国情报机构

23 第2章 猎杀本·拉登！

30 第3章 暗杀指南

39 第4章 变戏法的

45 第5章 委员会

65 第6章 启动猎杀

75 第7章 “凤凰”再生

摩萨德

85 第8章 禁 城

92 第9章 科曼的旅行

98 第10章 打击——马巴胡赫事件

115 第11章 《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里的炸弹——阿登纳事件

124 第12章 达摩克利斯行动——克莱因韦希特事件

137 第13章 海边寓所的屠杀——库克斯事件

149 第14章 上帝的怒火——“黑色九月”事件

163	第 15 章	惨败——布希基事件
173	第 16 章	有毒的夹心巧克力——哈达德事件
197	第 17 章	红色王子——萨拉马事件
217	第 18 章	科学家与妓女——米沙德事件
227	第 19 章	滴入耳中——迈沙阿勒事件
239	第 20 章	跆拳道运动员——法希事件

以色列国内情报机构

253	第 21 章	致命的错误——卡瓦斯迈事件
262	第 22 章	B 计划——穆萨维事件
268	第 23 章	先发制人而非复仇
273	第 24 章	暗杀代数——亚辛事件
285	第 25 章	最高法院
290	第 26 章	光天化日——哈利姆事件
297	第 27 章	国家机密——马莱沙事件

其他情报机构的暗杀事件

305	第 28 章	湿活——施塔辛斯基事件
312	第 29 章	皮卡迪利——马尔科夫事件
318	第 30 章	米尔克的暗杀团伙——韦尔施事件
328	第 31 章	萨沙痛苦之死——利特维年科事件
335	附 录	
371	参考资料	

前 言

2012年1月，美国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CIA）一年前在巴基斯坦的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地区利用无人机攻势残杀500多人的有关信息刚刚开始透露出来的时候，德国电视二台（ZDF）曾委托有关人士进行过一项具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这家电视台想以此开启一档新的系列纪录片，第一期名为《我热爱的间谍》，借此可以让世人管窥詹姆士·邦德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该片中当然不会提及瓦济里斯坦。但进行问卷调查的研究小组对大家选择的结果目瞪口呆。参与调查的德国人有54%持这样的观点：中情局和摩萨德（Mossad）应该有“杀人执照”，德国情报机构也必须有“杀人执照”；而在年龄低于24岁的这代人里，表示可以接受暗杀小组的人所占比例竟然高达70%。

这次调查让人们想起了之前进行过的问卷调查。这里实际上涉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德国是否同意针对特定的罪行引入死刑，也就是能否在相关的法律基础上处死一些重罪犯、奸杀犯和杀害儿童的犯人。1977年，有三分之二的德国公民同意引入死刑，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比例急剧下降，2007年有76%的德国公民投票

反对死刑。

如果新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信，那么就说明，当今大多数人竟然觉得采用隐蔽方式执行死刑的做法可以被接受。公开认可死刑当然不行，因为这与自由、开明的时代精神相悖，但在一定非正式的范围内，用那些强有力的、在暗中作业的特工和精英力量之权力来实施死刑却没有问题。难道他们就不能像美国和以色列特工那样，为了抵御恐怖危险而为祖国干脏活的同时，并不危及以自由、开放、人道为基调的社会吗？难道国家授权的谋杀在德国真的就能够获得多数人赞同吗？玩着“枪战游戏”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中十之七八真的就认为他们的政府组建特别行动队、指派暗杀任务完全没有问题吗？

1993年6月27日在巴特克莱嫩镇（Bad Kleinen）僻静的小火车站，德国联邦警察第九国境守备队对红军派（RAF）头目实施逮捕时出了意外，很可能导致了左翼恐怖分子沃尔夫冈·格拉姆斯（Wolfgang Grams）死亡。过了几天就有人怀疑，他是被第九国境守备队的一或两名警员给处死的。相关讨论持续了几个月，很多媒体嗅到了至少是冲动杀人的气息，由于出现了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难以想象的玩忽职守以及（通过一个联络员角色进行的大范围的遮掩，各种谣诼应运而生。后来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报告毋庸置疑地证实了，格拉姆斯当时确实举枪瞄准了自己，全德国都松了口气。警察的精英团队的确没有杀人，既未故意杀人，也未情急杀人。

二十多年来，时间的流逝以及发生的许许多多恐怖袭击显然改变了原先判断的尺度。现今看来，社会安全远远重于国家法律制度。根据法律，目的明确的杀人就是谋杀，除非存在非常明确具体的自卫情形。相应的规定明确指出警员可以发出最后的救命一枪：

“根据规定只有当击毙成为唯一的摆脱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或严重伤害以及躯体致残的手段之时，才可以将其用作最后一招。”（德国许多州的警察法如是规定。）联邦政府国防军可以在武装冲突或者战争中目标明确地杀死敌方士兵，而面对平民，只有在他们全副武装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时候，才能开枪。在军事交火时使用无人机攻势来支援自己的地面部队或许说得过去，但不清楚有些人群是否直接参战，或者当时并未参战却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几个月后才参战时，针对这些人发起进攻，却是背离国际法准则的。然而解释权却总掌握在进攻者手中。进攻者可以宣称，拥有关于这位或那位目标人物的足够信息。进攻者也可以如同在瓦济里斯坦行动时那样，干脆把整个地区置于某种总体怀疑之中。他们的基本信条是，我们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Langley）的中情局地下室的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地区的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可能是基地组织或塔利班的协助者，至少也是同情者，所以这些人就该是我们的靶子。无须顾忌具体情况，对那些生杀予夺的决定根本就不必再进行审核。法制国家常常也不走法律途径。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国防军也要购入自己的无人战斗机。虽然“欧洲鹰”（未装备武器的无人侦察机）已经被证实是一次巨额投资失误，国防军仍然坚持自己的计划。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护卫国土几乎用不着这种无人机，因为在空战中面对敌方的歼击机，它一点机会都没有，而且未装备武器的无人侦察机显然在德国领空得不到飞行许可。装备了武器的无人机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才有意义，在那些地区，参战人员伪装成平民，而且作战对象并不是正规军和正规空军。例如，一定要跑到兴都库什山去捍卫德国安全吗？否则我们的将领们要那些军事玩具又有何用呢？用来在世界各个地区对恐怖分子、疑似恐怖分子至少是可疑分子进行声势浩大的追捕？还是用

来进行定点杀戮？

在华盛顿或者耶路撒冷，好些年以来人们早就把关于法律上甚至道德上的讨论视为（往好里说）学术上的聒噪。无论国际上多少国际法专家和人权主义者多么激烈地批判情报组织的暗杀行动，美国和以色列的政府官方法律专家直接无视所有的异议，或者他们就写出长达几米而又破绽百出的宏文来把那些处决行为合法化。他们的既定目标十分明确：任何做法，只要对国家安全有利，或者哪怕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利，那就是好的，其他一切都必须在这个目标之下。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或是以色列的相应机构 8200 部队（Unit 8200）无所不包的监视项目，适用于中情局、辛贝特（Shin Bet）和摩萨德以及其他所有特别军事部门的“杀人执照”。在拿不准的时候保证自由？这在今天听起来多少有点像是怀旧时的废话了。

究竟有没有人研究过这样的问题：这类处决攻势在平民中造成的附带伤亡是否只会产生更多的仇恨和怒火，从而造成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却并不能消除恐怖主义？2010—2012 年，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在与恐怖活动斗争的过程中杀死了两千多人。“我不认为这是与恐怖主义作战的有效方法。”前任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G. Alston）谴责这种“定向杀戮”。这种行动往往直接杀掉“一整张名单”。奥尔斯顿说：“这种行动还会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相信杀掉成千上万人就可以战胜恐怖主义，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我在许多年前开始关注特工组织的定向清除时，这方面很多事情听起来就如同传说般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就像詹姆斯·邦德的故事一般。摩萨德为回应 1972 年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惨遭血洗，策划了一系列报复行动，人们大多对此报以心照不宣的微笑。而

这只不过是谣传。数年之后人们才明白，当时以色列进行的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本身的、疯狂且盲目的报复，而不是针对策划慕尼黑血案幕后者的报复。根据现今的了解，几位在一系列报复行动中的受害者与策划慕尼黑奥运村袭击事件根本毫无关系。他们必须被处死，仅仅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得手，例如瓦埃勒·祖埃特（Wael Zuaiter）；或者他们早就是以色列人的眼中钉，例如阿里·哈桑·萨拉马（Ali Hassan Salameh）。

此外，比较著名的是几个东欧情报机构的刺杀案件。这与冷战期间的敌对形象相吻合。克格勃（KGB）和东德国家全部斯塔西（Stasi）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类传说还是比较靠谱的。美国国会整理出一份材料表明，中情局在越南的“凤凰计划”行动中，甚至系统地成批杀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解开了拴住恶狗的绳子，那些恶狗就张口狂咬。直到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上任，才正式颁布法令，禁止在法律框架之外进行谋杀，尤其禁止政治谋杀。时值1976年。虽然福特总统的“行政命令”从未被取消，但比尔·克林顿、乔治·W. 布什（在“911”事件之前就已如此）和贝拉克·奥巴马从来不觉得这项法令对他们有什么约束力。

自2000年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在以色列的定点定向谋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由于摩萨德主要负责国外事务，不在巴勒斯坦地区活动，以色列的其他情报机构和特别部门也都获得了“杀人执照”。2005年大起义结束时，死于谋杀行动的巴勒斯坦受害者超过100人。暴力与反暴力互为因果：在同一段时间里，死于巴勒斯坦的自杀式暴力袭击的以色列人是当地人的5倍。2005年之后，比例关系发生了逆转：几乎每100名被定向处死的巴勒斯坦人，相对应的，就

有 55 名以色列人遇难。这与一些有效隔离手段（篱笆、墙）和高效的情报工作有关，上述手段遏制了恐怖活动的势头，但显然与杀鸡儆猴似的处决并没有什么关系。而自 2008 年以来，由于美国的无人机，估计有 2500—4000 人死于非命，这个数字大约与由恐怖分子 2001 年制造的“911”事件和此前所造成的受难者数字相当。

数数尸体——用敌对一方的死亡人数来祭奠我方的蒙难者？而又无法预测这种情况到何时是尽头。定向定点谋杀在以色列和美国成了一种通行的做法——即便是 2013 年 5 月奥巴马的暂停令也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地带、瓦济里斯坦、也门还有索马里，不久后也有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对人的追踪猎杀还在继续进行——无人能够阻止这一切。

2010 年 1 月摩萨德在迪拜行刺之后，德国西部广播电台（WRD）《故事》栏目组的编辑问我，是否有兴趣拍摄一部有关以色列“杀人执照”的纪录片。我有兴趣。在两次采访的行程中，我与一些老相识又重新建立了联系，主要是加德·希姆罗恩（Gad Shimron），此人当年是摩萨德的特工，后来成为记者。我们俩一起穿过整个国家，他带我看那些发生历史事件的地方，还有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巩固的界线这类新“成就”。我们一起坐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就“定点杀戮”这个话题交换意见。希姆罗恩很快就表明他对以色列的政策持批评态度，尤其对特别军事部门的“恣意开枪”行为不满。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摩萨德的行刑，例如对迪拜的哈马斯军火商马哈茂德·马巴胡赫（Mahmoud al-Mabhouh）的处决，是理性的行为。虽然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各异，不尽相同，但我这本书借鉴了不少他的独到见解。希姆罗恩作为记者与摩萨德元老雅各布·梅达德（Jakob Meidad）[别名安东·金茨勒（Anton

Künzle)], 合写了讲述刺杀战争罪犯赫伯特·库克斯 (Herberts Cukurs) 的《里加刽子手的丧命》。对于我而言, 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寻找真相, 还不如说是在制造神话。只要好好分析一下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的工作是多么迟钝而又粗枝大叶, 便会发现, “摩萨德神话” 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

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帮助我进行调研的人, 尤其是安妮塔·阿卜杜拉 (Anita Abdullah), 还有奥伦·盖勒 (Oren Geller)、阿萨夫·祖斯曼 (Asaf Zussman)、乌里·布劳 (Uri Blau)、沙万·贾巴林 (Shawan Jabarin)、萨默尔·布尔纳特 (Samer Burnat)、萨姆·巴胡尔 (Sam Bahour)、萨尔瓦·杜艾伯斯 (Salwa Duaibes)、希沙姆·沙拉卜提 (Hisham Sharabti)、马吉德·加纳耶姆 (Majed Ghanayem)、伊弗雷姆·阿斯库莱 (Ephraim Asculai)、伊桑·布朗纳 (Ethan Bronner)。我还要向下列让我熟悉了以色列官方论证方式的访谈者表示感谢, 他们是穆提·科菲尔 (Moti Kfir)、埃利泽·“盖泽尔”·察弗里尔 (Eliezer “Geizi” Tsafrir)、米什卡·本-戴维 (Mishka Ben-David)、阿萨·卡什尔 (Asa Kasher)、阿里耶·沙利卡 (Arye Shalicar)、伊夫塔赫·斯派克特 (Iftach Spector)、阿姆农·斯特拉什诺夫 (Amnon Straschnov)。感谢海克·克里格 (Heike Krieger)、菲利普·奥尔斯顿、艾亚尔·本韦尼斯蒂 (Eyal Benvenisti) 和莫迪凯·克雷姆尼茨尔 (Mordechai Kremnitzer) 给予我的有关国际法方面的帮助。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 我在德国电视一台 (ARD) 2013 年 4 月播出的纪录片的基础上扩充了美国的相关处决案例, 此外还增添了一些曾引起极大关注的历史案件。在加工处理这些案例时, 我既采用了公开发表的材料, 也使用了一些迄今尚未公开的材料。在再

现瓦迪厄·哈达德（Wadie Haddad）的毒杀案以及同时发生的“兰茨胡特”（Landshut）绑架案时，蒂姆·盖格（Tim Geiger）和托马斯·斯凯尔顿·鲁滨逊（Thomas Skelton Robinson）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2010年我在为德国电视一台制作纪录片《死亡巧克力》时也曾经整理过上述案件的材料。原东德国家安全局档案馆（BStU）的职员克里斯蒂安娜·施特格曼（Christiane Stegemann）做出了大量努力，最终在柏林沙里泰医院找到了有关一位中毒死亡的男子的材料，而这显然就是瓦迪厄·哈达德的材料。我要特别向当年参与行动的人以及目击者如巴萨姆·阿布·谢里夫（Bassam Abu Sharif）、汉斯-约阿希姆·克莱因（Hans-Joachim Klein）和彼得-于尔根·博克（Peter-Jürgen Boock）以及我的同事尼娜·斯文松（Kollegin Nina Svensson）致谢。我还必须提及的是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和亨宁·西茨（Henning Sietz），他们提供了很多文件和照片。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一系列来自以色列、美国和德国并且提供了许多信息和见解的人，他们明确地表示不必在此列举名字。我感受到他们对此书的善意，因为他们认为那些系统地破坏法制国家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价值的做法是非常成问题的。

埃格蒙特·R. 科赫

2013年6月30日，于德国不来梅

第1章

无法官判决：情报部门的谋杀行动

这在政治上是一种很有优势的做法：费用低，不伤及美国人，给人深刻的印象……在自己的国家里只有优势，只是在外国不那么受欢迎。而这种做法给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要从长远的角度，才能显现出来。

——丹尼斯·C. 布莱尔（Dennis C. Blair，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谈论关于美国武装无人机的杀人任务）

下列场景很可能会长久地损害这位全国顶尖的、年轻的、自由开明的法学教授，后来《纽约时报》揭示了此事是如何发生的。

2010年1月19日，几十位安全顾问聚集在白宫的战情室中，进行安全状况的每周例行讨论。这一聚会在政府内部称为“周二反恐会议”。情报人员将向总统汇报同基地组织及其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斗争的最新情况，为这项或那项针对伊斯兰恐怖活动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征求总统的许可，而这些行动将以一个最新的“提名列表”呈现在总统面前。这纯粹是例行公事，实施杀戮计划的官僚仪式。